

藏館本

137571

回憶魯迅

馮雪峯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9(7)1 137571
3112:6
v.2 18120

回憶魯迅

馮雪峯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北京

總 109 單 36 32 開 228 定價頁

回憶魯迅

馮雪峯著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八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4 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華夏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40000

定價 7,800 元

目 次

一九二九年

一 我怎樣去見魯迅先生.....

二 觸到他自己的談話之一.....

三 觸到他自己的談話之二.....

四 我對於他的思想方法和他的天才的特徵的一二理解.....

左聯時期

一 魯迅先生對左聯的態度.....

二 這時期所表現的思想毅力之一.....

三 這時期所表現的思想毅力之二.....

四 關於他和羣衆的聯繫.....

五 民族的感情和階級的感情.....

六 關於他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誼.....

一九三六年

- 一 在病中和在新的政治形勢下的他的情緒之一.....
- 二 在病中和在新的政治形勢下的他的情緒之二.....
- 三 思想上又有新的發展的徵象之一.....
- 四 思想上又有新的發展的徵象之二.....
- 五 逝世.....

[三] [四] [五] [六] [七]

一九二九年

一 我怎樣去見魯迅先生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柔石帶我去見了魯迅先生，從此我就跟魯迅先生接
近，一直到他逝世之日為止。

我去見魯迅先生，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我從柔石談到魯迅先生的話裏，覺得
魯迅先生是很好接近的，他是真正肯幫助青年的。另一個原因，也就是我去見他的主要
目的，是我那時候正在從日本文譯本轉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作品，碰到的疑難，沒
有地方可以求教，知道魯迅先生也在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翻譯工作，所根據的也
是日本文譯本，所以我去見他，是想請他指教，並且同他商量編一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

論的翻譯叢書●

柔石，是一九二二年前後我在浙江第一師範讀書時候的同學，同時他和我都是那時候杭州農光社（青年文藝團體）的社員，在學校裏是他比我高三個年級，可是我們差不多同時離校，因為我在一年級就停學了。以後就只有兩度很短的時間在一起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我在家鄉一個中學教書，被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十一月間逃到了上海，他先知道了我的住址，就先來找我了。

他快樂而平靜地告訴我：他同幾個朋友弄了一個朝花社，魯迅先生也算作同人之一，想出叢書和畫冊，介紹歐洲的文學和版畫。他們就住在魯迅先生的隔壁。——他談得很多，大都關於魯迅先生的事情，而對於魯迅先生對青年的誠摯懇切的態度，以及他對柔石本人的幫助等等，還說得特別認真，好像要對我證明似的。

柔石並且告訴我，魯迅先生也會經談到過我的。因為我譯過蘇聯的《文藝政策》一

即「科學的藝術論叢書」，預定出十多本一套，後因國民黨反動政府禁止，只出版過八本。——魯迅先生翻譯的《藝術論》（普列漢諾夫著）《文藝與批評》（盧那卡爾斯基著）《文藝政策》都曾經編入。

本書，那時候已經出版，魯迅先生也在譯它，在『奔流』上面連載，他說，就從這件事情談到的。他又說，魯迅先生也提到過我在一九二六一二七年翻譯過日本昇曙夢著述的關於蘇聯的文學、演劇、跳舞等三種小冊子的事情，認為這種介紹對中國文壇是有好處的。

過了幾天，柔石又來看我了，帶來了一本日本文譯本的關於辯證法的小冊子，我已經忘記了原作者的名字，他說這是魯迅先生送給我的，還複述了魯迅先生對他說的話道：『我買重複了一本，去退還內山書店也麻煩，你帶去送你那個同學去罷，省得他再買了。』

這一天，柔石談得更多，其中曾經談到了同創造社論戰時候的魯迅先生的心情。據柔石說，魯迅先生當時的心情是很壞的，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了。于是，柔石也把魯迅先生看了我的一篇文章之後曾經很反感的事情告訴了我。那是在半年多以前，我在一個名叫『無軌列車』的雜誌上面發表過一篇題名『革命與知識階級』的東西，也是關於一九二八年初創造社和魯迅先生的論爭的；柔石說，魯迅先生看到了，當初很反感，說道：『這個人，大抵也是創造社一派！』不過，柔石接着又說，他自己的看法並不如此，他

對魯迅先生解釋過，認為我的文章的主旨是在批評創造社的小集團主義，因此，魯迅先生以後也就沒有再說什麼了。

柔石還談了一些別的，我都不詳記了。

他的兩次談話，雖然始終談得很平靜，好像談家常一樣，却使我很感激魯迅先生，並且很衝動，想馬上就去見他。

說到這裏，我還想再敍述一點在我感激的心情裏面含着非常慚愧的情感，以及我怎樣開始改變過去對魯迅先生性格上的一些不正確的看法這類事情。

譬如柔石提到魯迅先生曾經很反感我那篇文章，我聽到的當時是非常地感到慚愧的，因為我認為這完全不是出于魯迅先生的私心，而恰恰是他看穿了我的膚淺和輕浮，這膚淺和輕浮是我自己已經感到的。實際上，那篇東西發表後不久，我已經知道了我的錯誤，尤其討厭在語氣上所表現的我那種「像煞有介事」的輕浮的態度。我因為幾個月前，要選魯迅先生在北京時所寫的作品做教材，就曾經比以前更細心地重讀了『呐喊』、『墳』、『熱風』和『華蓋集』等，覺得我過去的理解不但淺薄，而且武斷；同時也開始有些覺得，我是很受了機械論的觀點的影響的。

我翻譯過蘇聯的『文藝政策』，我很受這本書的影響。舉例說，其中有對於宗派主義的正確的批評，因此我就有根據，敢于指出那時創造社的相類似的宗派主義的存在，這是我受的好影響。但其中也收錄了討論文藝政策的會議的發言記錄，在發言記錄中就有幾個機械論者和機會主義者的不少言論，我也同樣受了影響了，例如我也機械地把魯迅先生派定為所謂『同路人』；就是受的當時蘇聯幾個機械論者的理論的影響。這幾個機械論者後來在蘇聯是被批判和清算的了，可是他們就曾經對高爾基有過輕率和錯誤的認識，也會經把高爾基看成爲『同路人』的。

我重讀了魯迅先生的幾種作品之後，雖然還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機械論的錯誤（這也就是我們後來被清算的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錯誤），但也已經覺得在那篇文章中我完全沒有認識魯迅先生的戰鬥與工作的巨大的革命價值，這是我的錯誤的主要所在。所以，我已經開始明白我那文章雖然批評了創造社，並且替魯迅先生辯護，然而我只是消極地辯護，却並沒有真的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於是也沒有認識魯迅先生對革命的作用。我的錯誤在基本上是和那時創造社相同的，因爲那時創造社打擊魯迅先生，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沒有認識魯迅先生的革命價值。不同的，只在于創造社是攻擊魯迅

先生，說他『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我則替魯迅先生辯護，說他只是不革命，但對革命却是無害的，而創造社攻擊他，這是創造社的宗派主義，如此而已。我也並沒有明確地承認魯迅先生對於革命的積極作用和價值，同時也沒有提出應該如何團結他的建議。

加以我已經自覺到我那篇文章在態度上的輕浮，所以當聽到柔石說到魯迅先生的反感的時候，我確實感到慚愧。可是，因此，我的感激也就加倍了。我想，這對於我是一種最好的教育，將使我以後在學習和工作上能够誠實和虛心起來的。

其次，我也就開始改正我過去對魯迅先生性格上的一些不正確的看法。明白地說，我根據自己的一些片面的印象和主觀的偏見，我以前是並沒有應有地尊敬魯迅先生的。我從前在北京時憑我自己的片面的印象所構成的魯迅先生的性格，就和柔石所說的很不相同。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之間，我在北京過那時所謂的流浪生活，曾經走進北京大學的教室聽過幾次魯迅先生的講課。我得了一些印象，又從別人那裏聽來了一些，我判斷他是一個很矛盾的人。我在心裏曾經這樣地說他：魯迅，確實非常熱情，然而又確實有些所謂冷得可怕呵！我看見他號召青年起來反抗一切舊勢力和一切權威，並且自己就願

意先爲青年斬除荆棘，受了一切創傷也不灰心；可是我覺得他又好像蔑視一切，對一切都懷有疑慮和敵意，彷彿青年也是他的敵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敵人似的。總之，我以爲他是很矛盾的，同時也認爲他是很難接近的人。雖然那時我和未名社的韋素園、臺靜農、李霽野等都很接近，也常常聽他們談魯迅先生，並且知道他們直接接受魯迅先生的指導，他對他們的幫助是很大和非常真誠的，但我並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我主觀上所以這樣地理解魯迅先生的性格，除了根據片面的印象之外，也還由於讀了他陸續發表的散文詩（就是後來收到『野草』中的）的緣故。但現在分析起來，主要的還是因爲我還不能從社會的觀點去分析和理解他的思想與作品的緣故。

我那時認爲李大釗同志才是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雖然我那時候還不是共產黨員。我是受了李大釗同志的殉難的刺激，才加入共產黨的。我也從沒有見到過李大釗同志，只讀過他在『新青年』上面發表的幾篇論文和一首小詩，聽見過關於他的革命事業和他做人的一些傳說。可是，我非常相信他的淡泊是真的淡泊；同時，我覺得他的樸實的文章的力量以及關於他的人格的傳說，就都是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信念的最真實的證明。我那時開始覺得，做這樣的人才是我們青年的道路；同時就開始讀一些社會

科學的書。後來，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釗同志和別的一批革命者被張作霖絞死了，第二天報上看見，我的腦子曾經有一兩分鐘好像失去了感覺，有兩三天我好像俗語所說的失去了魂魄似地沒有一點主意。這個刺激，對我有最大的影響，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是的，我認爲李大釗同志是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這個認識是完全沒有錯的。從這一方面，表現了我也是一個虛心學習的、向上的、有爲的青年；在這上面我並不顯得幼稚和自以爲是的主觀主義。但是，我並沒有進一步地去學習李大釗同志和其他真的共產主義者，却自以爲已經懂得了一些，甚至以爲自己已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就只因爲自己崇拜着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以及讀過幾本社會科學的書。這不但是我的幼稚可笑，而且顯出了我的不學無術的不虛心的很壞的一面，這一面就妨礙我學得更多一點，懂得更多一點，到現在我都還要時時跟自己的這一面鬥爭的。我的這種幼稚和不虛心，也就是我以前沒有應有地尊敬魯迅先生的原因，就是說，我是很主觀的，自以爲是的，所以我以前所得的關於魯迅先生的印象是不正確的。

當然，我並不是說，我以前沒有給魯迅先生以應有的尊敬，或者沒有把他跟李大釗

同志一樣地來崇拜，我就應該受自己大大的責備。我不是這個意思，同時也是不必要的。我只是說明我以前對魯迅先生的看法，後來覺得不正確了，並且分析了所以不正確的原因。至于自己的主觀和不虛心，那是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應該受責備的，決不是只因對某一個人不虛心才應該受責備的。

現在，柔石平靜地向我描述出來的魯迅先生，是把我過去的疑惑和偏見都掃除了。

柔石的樸實和忠厚的性格，以及他在魯迅先生對他的友誼和愛裏面所表現的自然與純真，也是我什麼時候一想起，都栩栩如生，好像就在眼前一樣。

我那時感覺到，現在也同樣感覺到：在柔石的心目中，魯迅先生簡直就是他的一個慈愛的塾師，或甚至是一個慈愛的父親，却並非一個偉大的人物，而魯迅先生也是像一個父親似地對待他的。

其實，也不只對柔石一個人，魯迅先生對一切好的青年都不自覺地流露着『父愛』的感情的，這一點，一切同他接近過的青年都能够證明。

因此，我那時覺得，現在也同樣覺得，柔石在我還沒有請他介紹之前就約我去見魯迅先生，也就好像約自己的一个朋友去見他的塾師或見他的父母一樣。我想，正是柔石

的介紹，使我很快就能夠受到魯迅先生的指導和取得他的友誼了。

在一個晚上，我第一次去見他，就是帶了書去求教的。我記得帶了一本日本雜誌去，其中有德國蔡特金或別的人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論文的譯文，有幾處附有德文原文，我看不懂，因為魯迅先生懂德文，我就去問他了。同時也帶了我正在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與社會生活』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譯本去，問了幾個我疑惑的地方。

的確，魯迅先生的老規矩，對於初見面的人，話是極少的。我記得，柔石把我帶去了以後，他自己有事就先走了，魯迅先生除了回答我的問題之外，就簡直不說什麼話，我覺得很侷促，也很快就告辭了。第二次去見他，話仍然不多，雖然我已經提出請他翻譯普列漢諾夫的幾篇關於藝術起源的通信體的論文，編在我在發動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的第一本的意思，而他也當即答應了。但是，以後他的談話就一次比一次多了。

大概過了兩個月，柔石替我在他附近找到了房子，於是到魯迅先生那裏去的次數也多起來，談的話也更多，常常談一兩個鐘頭以至三四個鐘頭，大都在晚上。

下面我要把談話的情形，就能夠記得的，敘述一些。

二 觸到他自己的談話之一

那時候，往往到十二時以至十二時以後的很多晚上的談話，幾乎每一次都觸到了魯迅先生自己的思想情況的；我現在還記得一些的也大半屬於這一部分。

這種談話，總是由兩種情形引起來的，或者由於他從他正在翻譯的論文或正在閱讀的書中有所收穫，就高興地談起來，於是談到了他自己過去的見解和現在的思想。那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所寫的關於文藝的論文和社會科學的書籍，都是日本文譯本，當時日本介紹得很多，而上海都能買到。那種時候，總是我一去，他讓我坐下，就愉快地說起他譯了什麼作品或看了什麼書，而後緊接着說：「實在得益非淺！」於是就談下去。在這種時候，他真的非常健談，而且顯得快樂、年青，時常夾着他那爽朗的出聲的笑。談話自然都是沒有系統的，常常一拉就拉到前後全不相關的什麼事情上去，非常隨意，就是所謂閒談；而在這種閒談中間，他就常常會不知不覺地談到了他自己。

或者由於別人批評到他，他就談起自己來。對於別人的批評，根據我的印象，有的時候他確實是有『牢騷』的。但是，不用說，如果那『批評』是來自各個反動派方面的，不外說他『尖酸刻薄』或誣衊他『拿盧布』之類，那他當然不會有『牢騷』。平常總是提到了什麼人或什麼刊物又是怎麼說怎麼說之後，照例眉頭一皺或臉一沉，表示了他的憎惡，就不再談下去了；而有時，還很高興似地大笑起來，表示他的勝利，因為敵人對他的誣衆，分明由於他平日攻擊了敵人，敵人受了傷、感到了痛的緣故。在閒談時候，我還覺得，他對敵人的蔑視和冷酷，要比他在文字上所表現的來得更厲害。我想，這大概由於在文字上，他面對着的是整個舊社會，他是把個別的具體的反動分子及其行為思想，跟舊勢力、反動勢力聯在一起去看的，所以他的觀察就更全面，他的分析更深刻、尖銳和徹底，他的胸懷和氣概也更開闊和雄壯；可是，這樣，他也就不能不覺得任何個別的反動分子及其思想行為都是有勢力的，都不能不把他們當作有強固力量的舊勢力來看的，於是他的思想裏面總處處有着敵人『韌戰』的暗示，他的對敵人憎惡而對人民滿腔熱情的感情裏面也多少要反映着他对社會的不滿的情緒。當然，這種對社會的不滿的情緒，決不是他對敵人的示弱；可是，在閒談的時候，魯迅先生就好像暫時從社會的壓力之下解